

化危為機： 計量時代綜合性學術期刊的困境與出路

劉京希

[提 要] 學術期刊之本質,一個本來不是問題的問題,在量化思維盛行的計量時代,卻成為業界的持續性熱門話題。體制性因素的介入,使得量化評價體系被行政性異化,成為絕對性、排他性甚至強制性評價標準,而被抬升至宰制性地位,形成事實上的“一刀切”式“量化剃刀”,以之格式化地裁切所有期刊,而無視期刊尤其是綜合性學術期刊的學科特性不同、風格迥異所造成的差異化發展生態。對於深陷外部評價困境的綜合性學術期刊而言,走“小綜合,專題化”的“中間態”辦刊路徑;以問題凝練學科,而非以學科切割問題;提高期刊內容的集中度,獲致集約與集群效應;以凸顯特色、個性和品牌為前提的“歸核化”經營,構建以主導性問題欄目為軸心的同心多元體系,也許是跳脫這一困境,固守和張揚期刊自我風格的主動性與主體性選擇。

[關鍵詞] 計量時代 計量思維 評價正義 量化評價 定性評價 綜合性期刊

[中圖分類號] C0;G2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20)03-0110-13

對於人文社科學術期刊從業者而言,怎樣認識和看待學術研究與學術期刊,決定了我們將怎樣塑造一本學術期刊。從對於事物的認知也即從認識論的角度來看待學術期刊,它應當是有生命、有性格的鮮活的存在,更應當是一個主體性的存在。也就是說,它應當有主格、有品格、有刊格,它應當有自身的學術追求,以物化的形態被塑造成為個性化的精神存在,以承載與踐行其豐富和繁榮學術事業的使命。

因此,就其存在的價值和使命而言,學術期刊所最不應當成為的,是從業者藉以追求功利性外在目標的工具性客體——學術期刊這一事物自打出現以來,就未曾被賦予這樣一項職能。當然,那種一兩頁一篇,一本期刊一期發表上百篇的所謂論文,肯定已經不能再被定義為學術期刊了。就此意義而言,從業者只有以上述眼界來看待、認知進而經營和建設一本學術期刊,才有可能使之成為富有其本原價值的物質呈現和精神質性;進而,從業者的存在意義和職業價值才可得以最深層次的認知與發掘。在這裡,從業者的存在意義已經與期刊的學術價值融為一體。

學術期刊之本質,這個本來不是問題的問題,在計量思維盛行的計量時代,卻不期然成為問題。尤其是對於深具中國特色的綜合性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及其從業者而言,在量化評價一統江湖

的格局之下,其左支右絀、進退失據的窘態,更加暴露無遺。在此背景之下,對於計量時代綜合性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所面對的困境及其突圍的路徑予以探討,顯然仍有其必要。本文的立意,即在於將綜合性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置於大數據尤其是計量時代的歷史場景,考察其生存與發展的處境及困局,探尋其脫解之道,展望其未來的可能前景。

一、計量時代、計量思維與量化評價

大約從 20 世紀 50 年代中期開始,人類從工業社會進入到以計算機技術為標誌的信息化社會。之於後發的中國大陸,則是在世紀之交,以工業化與信息化相交混的方式,全面進入信息化社會。就是這歷時短短二十載的信息化時代,之於學術期刊界而言,則尤顯漫長。其原因在於,就是在這短促的二十載之間,刊界便經歷了從大數據時代到計量時代的兩次蛻變!

無疑,我們早已邁入以互聯網為標誌的信息時代。而隨着網絡信息技術的進步與飛躍,“大數據”成為這一時代的新特徵,表徵着一種新的文明形態的產生。如果說,信息社會的初期階段,其主要特徵是以信息技術為主體,重點是創造和開發知識;那麼,信息社會的近前階段,則是在創造與開發知識的同時,轉而進入數據應用與無限擴展的新場景。因此,有人把以互聯網、大數據、雲計算為代表的“大數據時代”稱為“數字文明時代”,因為它以全新的思維方式,全新的生產與生活方式,全新的生產關係和社會關係,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而由互聯網應用這種生產方式所促生的新的生產關係,定將是社會學家、政治學家、歷史學家必須面對的現實問題,這樣的問題也必將影響社會制度的變遷和世界格局的改變,因此人類必須面對數字文明時代來臨時的一切現實問題。^①

這個新場景,在筆者看來,又可切分為“大數據時代”和以之為基礎的“計量時代”。也許,有賴於大數據技術的支持和鋪墊,由信息化時代而計量時代,看似成為歷史的必然。前者的特質是以海量信息為資源形成客觀性數據庫,以為政府、社會與大眾提供單純的數據服務;後者則是以基於海量信息的篩選、計量與考核為特徵,如此就形成了有賴於大數據的所謂量化客觀評價特質。從對於事物予以評價與考核的角度來看,把當下時代稱之為“計量時代”,恐怕再貼切不過了。因為它涉及的不僅僅是數據的幾何級數的暴增與便捷的網絡檢索,而且是通過對數據的規範化分類處理,進而以之為依據,進行數據計量和評價。如此,我們所遭遇到的首要問題,便是如何看待和定義“計量時代”。

要弄清“計量時代”之所指,首先需要明確“計量”之要義。按照“百度”提供的定義,所謂計量,即利用技術與法制手段實現單位統一和量值準確可靠的測量。任何測量都要有一個統一的體現計量單位的量作為標準,這樣的量稱作計量標準。而計量之要旨,僅僅有計量單位的量的標準是不夠的;它更加須臾不可離的,是量值的傳遞和保證量值統一所必須採取的措施、規程和法律制度。失去規程和相應法度的規定與推行,計量標準便只具有形式意義。

由此便知,所謂“計量時代”,即是基於海量數據信息,以信息技術為工具,以數據計量做為對任何事物進行衡量、評價與考核之標準的時代。比如廣泛存在於經濟領域的 GDP 考核,行政領域的“一票否決制”,高教領域的年度綜合排名,科研領域的“來源期刊”發文章量排序等等,不一而足,充斥於各領域、各部門、各行業。這樣一個以數據為標準、拿數據說話、唯計量是從的時代,難道還不可謂之“計量時代”?

如果我們認可這樣一種基於技術的文明形態,那它也是一種較為低級的文明形態。原因很簡單,它基於一種以量化評價為特質的同一性思維或一元化思維。這種思維在哲學上看無疑是有欠

發達的思維形態,而以此種思維方式所呈現出的文明形態,能夠稱得上高級文明形態嗎?

計量時代,不過是這個時代的顯性特徵。其隱性質性,則在於無所不在的計量思維,和與之相表裡的量化評價。

所謂計量思維,概指凡涉及對於事物與人的行為的定評,均以計量或量化為衡量與取捨之首要標準的理念或思想。前述廣泛存在於經濟領域的 GDP 考核等等,無不是拿數據說話之計量思維的產物和作為,進而形成風靡一時之量化評價。

而所謂量化評價,是指通過評價要素設定和數據分析的方式,對事物的發展過程和結果進行描述、解析,進而得出數量化結論的評價方式。即在評價一類事物或現象時,首先予以數字分類;然後進行同類要素之間的量化比較;最後完成加總排序,從而反映其高下優劣,以便起到評價的作用,達致量化評價的效果。各省 GDP 年度增長率的橫向比較與排名,即是典型一例。GDP 排名關涉地方政府及其首腦的政績評價,事關地方政府首腦的前程與命運,因此,對於這些年所出現的日趨瘋狂的“GDP 崇拜”現象,自然便不難理解了。

量化評價又被稱作定量評價,從而與定性評價相對應。比起帶有主觀性和或然性的定性評價,由於量化評價具有模塊化、公式化、計量化、定量化、形式化因而簡便易行的獨特優勢,深受相關管理部門、統計部門和評價體系的青睞而風頭正勁。但正是因此,它的弊端也同樣顯明,茲容後敘。

二、量化評價:是非自有評說

計量思維與量化評價風潮的盛行,表現在與學術期刊界切近的科研領域,那便是教學科研單位之間、學者個人之間僅限於來源期刊之發文的量化比較、競爭與考評。這一風潮,發端於量化評價體系被行政化之後的本世紀之初。自此以後,如何挖空心思地進入來源期刊方陣,或者不被這條“客船”無情地拋入波濤洶湧的大海而淹沒,成為所有學術期刊辦刊人的心結。其偏執之至,以致於原本代表着學者學術積累之最高水平的學術專著的寫作與出版,因為在考評過程中並不被作為首要考核要素計入量化“工分”,而遭致普遍性冷落。歷史學家何兆武先生在 2011 年曾經不無憂慮地講過一個有關學術人才評價的故事,並且委婉地指出我們的人才評價體系的問題之所在:我在歷史研究所的時候,一次評職稱,有個同事叫嚷:“我有一百萬字。”我當時就很不以為然,你怎麼論字數啊?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才幾個字?照這麼說牛頓根本不用評了。而且萬有引力定律搞了十七年,按照我們的規定他十七年都評不上。愛因斯坦的晚年要搞統一場論,結果沒有成功,但沒成功他仍是第一流的學者,放在我們現在的體制裡就行不通。我們這些年改革開放,等於轉到一個新的軌道上來,可是還沒摸索出行之有效的新辦法。^②

在國際學術期刊領域的量化評價,以 SCI、SSCI 指標最為人所重。而僅就本文所及的人文社科學術期刊領域來看,國內量化思維及其評價體系在人文社科學術期刊界的萌芽與嘗試,大約始於上個世紀末,至今也就是二十餘年時間,已然落地生根,一統江湖。驀然回首,似乎就在一瞬間。而經過這短短二十餘年近乎慘烈的競爭與搏殺,逐步形成了以 A 刊、B 刊、C 刊為代表的三足鼎立的量化評價體系格局。^③就日前態勢和可見前景而言,三者之中,C 刊尤其佔據並錨定更為強勢的有利地位。而今,諸般科研單位及其主管、主辦部門,在各類各層科研成果考評之中,無不以 C 刊為標尺,去衡量所發成果的多寡和優劣。雖然,各學術主辦單位另有根據自身情況所制訂的、用於內部掌握的期刊分級目錄,但大致不出 C 刊範圍。

這樣的評價體系設計,就在客觀上形成了“以刊評文”的奇特現象。換句話說,只要是發表在

來源刊的文章,因其“出身高貴”,便是好文章。這種“文以刊貴”、“人以文貴”之“唯出身論”、“唯成分論”的不合理評價取向,早已為國際學界所詬病。本庶佑曾深有感觸地說,有一種傾向,認為文章發表在有名的刊物上就是一流的工作。但是,與許多人的想象不同,真正一流的工作往往沒有在頂級刊物上發表。這是因為,一流的工作往往推翻了定論,因此不受人待見,評審員會給你提很多負面的意見,你的文章也上不了頂級刊物。迎合時代風向的文章比較容易被接受,否則的話,需要花費較長時間才能獲得認可。我認為《自然》、《科學》這些雜誌上的觀點有九成是不正確的,論文發表十年之後,還能被認為是正確的只剩下一成。^④但在同行評議制度尚不成熟的國內學界,“以刊評文”便成為一種無奈的選擇。

從學術期刊評價體系自身發展歷程來看,它的“初心”並非在評價,而是在數據服務。包括 SSCI,其創設的初衷,便是為作者更加合理與準確地選擇期刊以投稿,提供一個數據性參考。也許,正是大數據時代的來臨,為這些平台從數據庫轉型為評價體系提供了外部環境條件。當然,我們也不能排除這樣的可能性:從數據庫的服務職能轉型為評價體系之考評職能,內中所隱含的主觀性權力追求與獲取衝動,乃是完成此一轉型的更為根本的因素。

換言之,學術期刊評價體系初時在本質上只是一種便利於文獻檢索的引文數據庫(包括 SCI,是目前國際上公認的最具權威的科技文獻檢索工具,以及科研評價的依據)。一方面,它為圖書館、閱覽室和讀者訂閱期刊,為作者投稿提供了一個關涉期刊質量與發稿趣尚的觀察視角;另一方面,它讓辦刊人直觀地了解到以影響因子為表徵的客觀數據指標,由此從一個側面清晰地研判一本期刊在業界所處的位置與狀況、優長和不足,以便辦刊人作出針對性的應對舉措,這是數字時代所帶來的數據便利。也因此,客觀地說,評價體系的出現與存在,對於學術期刊質量的正向激勵作用不容否認。雖然,評價體系各有不足,但這不是問題的主要方面。問題的要害,更在於量化評價指標與由此所生成的來源期刊目錄的行政化濫用,使得評價體系失去了其本來的民間評價的性質,變形為帶有某種權力屬性的官方評價,從而造成諸多意想不到的弊端與後果。首先,我們來梳理一下量化評價體系自身的先天性弊端。

我們知道,量化評價體系一般以影響因子、被引頻次、即年指標、被引半衰期等作為評價指標,對一本期刊是否入圍來源期刊做出評定。其中,影響因子和被引頻次作為主要指標,至為關鍵。

這類指標體系的先天性不足或弊端,一是“唯量化是從”,或以定量評價為主、定性評價為輔,形成事實上的“一刀切”式“量化剃刀”,以之格式化地裁切與打磨所有期刊。因此,在評價過程中,忽視了期刊尤其是綜合性學術期刊的學科屬性不同、風格迥異所造成的差異化發展生態,消解掉期刊的個性風格與特色,尤其不利於人文類綜合性學術期刊的生存與發展。在此“剃刀”面前,諸多老牌人文學術期刊在究竟是保持既定傳統風格,還是丟掉自身傳統轉而謀求適應評價體系的裁切之間躊躇徬徨。難怪有同業主張,評價體系應恢復其數據庫之本來面目和相應的服務職能,而把評價權交還給業界同行。

二是扭曲“學術的使命在於將新知識用於社會普遍教育和公共事務”的本質。學術期刊繁榮學術事業這一根本目的,在業界原本毫無認知障礙,而今則成為日漸模糊因而需要重新思量的大問題。為繁榮學術還是為保住或進入來源期刊而辦刊,令身處其中的每個期刊人不得不時時處於焦慮與躊躇的茫然狀態。是遵循學術期刊自然成長與演化規律,在差異化競爭之中進行特色化辦刊,為繁榮學術事業服務;還是捨棄這些本質性追求,轉而投其所好,按照評價體系的格式化指標要求,去“做大做強”自己的數據?

三是形式評價壓倒內容評價，外部價值偏好評價壓制內部價值偏好評價。^⑤在現行學術期刊評價體系下，如果一個編輯部不勝量化考評壓力，那麼它在選取稿件的時候，首要的衡量和選擇標準，恐怕不是同行評議所看重的，以觀點、材料、方法為表徵的學術成果的原創性和創新性，也不是看該學術成果對於學術研究是否有所推進，概而言之，即文章的學術性；而是看文章選題是否切合當前的社會熱點，觀點是否足夠聳人聽聞，刊用之後是否會有足夠高的引文率等等，這些學術之外的、過眼烟雲般的要素。如業者所謂：“目前最突出的問題，是知識生產受到學術評價機制的影響，引用率等指標對辦刊理念和選稿方向等有誤導作用。”^⑥

或曰，難道就不能將繁榮學術與高影響因子追求相統一，使之相得益彰嗎？竊以為，拋開專業性期刊不談，至少就人文類綜合性期刊而言，這是一個不可能兼及和完成的任務。這是因為，在人文類綜合性學術期刊這一陣營，恰恰存在一個悖論——對於那些以人文見長的期刊而言，堅持既定風格，固守人文學統，必得犧牲影響因子；而追逐影響因子，就得拋卻人文積澱與傳統，犧牲既定風格，轉戰應用學科陣地，如此，“我”將“非我”。

繼而，再來看看民間量化評價體系被行政化、披上權力的光鮮外衣、被定格為宰制性評價標準之後，對於學術期刊辦刊目的的進一步異化。

當數據庫在量化評價方面所天生具有的“量化剃刀”式的簡便性與易操作性特徵，恰好吻合於行政主管部門的官僚化、形式化評價偏好之時；因而當計量思維與量化評價由民間評價轉型為官方評價系統，甚至成為唯一標準的時候，那麼它由一般性數據庫或評價體系到宰制式評價體系的蛻變，便成為必然。當然這也是諸多數據庫樂此不疲的追求。

筆者以為，行政管理部門的職責在於為學術研究提供服務與保障條件，而非介入學術評價過程。之所以介入其中，在行政管理部門看來，或者管理就是服務的應有之義；或者來自官方的評價才是最為權威的評價。當然，也或者按照保守主義的看法，有一隻“看不見的手”，總是按捺不住試圖去增進私人利益的衝動：“在政府活動的領域，正如在市場中一樣，也有一隻看不見的手，但它的作用正好同斯密的那隻手相反：一個人如果一心想通過增加政府的干預來為公眾利益服務，那他將‘受一隻看不見的手的指引，去增進同他的盤算不相干的’私人利益”。^⑦

正是體制性因素的介入，使得量化評價體系被異化為行政性或曰官僚化評價體系，成為絕對性、排他性甚至強制性評價標準，而被抬升至宰制性地位，以之定評學術單位、學者或學生個人。以之評判期刊的高下優劣，也便順理成章。只是拿如此外在、簡單甚至粗放的評價形式來定奪甚至決定一本期刊的命運之沉浮，不免令人唏噓。^⑧

以行政為主導的學刊評價體制，其實質乃是一種最簡化、實用的官僚管理制度，表面上看起來客觀、中立、科學，甚至“去價值化”。然而，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是帶有極大的主觀性且又極為複雜的思維活動，因此對於它的評價，充滿價值性判斷，只能在一個競爭性的學術公共空間之中獲得其內在尺度，而無法用一種外在的、一刀切式的量化管理指標來評估和衡量其高下優劣。^⑨

進一步，以行政為主導的學刊評價體制，導致“反智主義”傾向愈演愈烈。在人文社科領域，表現為以國內“核心期刊”或來源期刊發表論文數量和申請官方課題經費的等級/金額作為衡量“學術”的主要標準。民國那一代學者惜墨如金與厚積薄發的嚴謹學風已被“薄積厚發”的浮躁風氣所取代；當年北大文科研究所長傅斯年對新任年輕教師“三年內不許發表文章”的要求，也早已被“不發表就出局”所取代。^⑩

其結果是，不惟大學教師早已淪為“掙工分”的“計件工”，學術期刊也淪為燒製磚瓦的流水線

式“磚瓦廠”，期刊從業者則淪為“磚瓦廠”流水線上的搬運工。而行政力量介入其中的計量評價，所形成的“量化剃刀”式“一刀切”負效應，對於期刊生態的異化，較之自發性民間量化評價，無疑是大巫小巫之異。

一則，帶有濃厚的行政色彩的量化評價“兩年影響因子”偏好，過於看重期刊的當下影響力，而不注重考察期刊的歷史性學術貢獻即學術史價值（量化評價體系所謂“半衰期”），導致刊界唯“影響因子”是從，一味趨新、媚時、阿世，追逐焦點、熱點，造成對學術研究發展規律的無視甚至闖割，這種片面性行為被詹姆斯·威爾遜稱之為“選擇性關注”。如此，便在客觀上弱化了期刊的純然性學術追求和學術史價值的錨定，更是限制了期刊人對於長遠辦刊思路的謀劃與布局，戰略性思維大面積缺席。

在中國，自學術期刊作為新生事物產生，直到量化評價體系出現之前，將近百年的歷史時期，對於學術期刊的評價，基本上是由學界同行以及以之為主體的讀者來進行和完成的。當然，刊界同行在此時也是以讀者的身份參與期刊評價的。也就是說，是通過讀者的口碑來形塑一本學術期刊的學術聲譽與社會影響力。正因如此，也就不是一把尺子量天下。由讀者來評價，在他的眼中，就只有所刊論文之質量的優劣、創見的有無，編者是否具備善於發現和引領學術思潮的眼界，以及期刊的特色是否鮮明、質量是否恆定，而不抱持任何功利目的。^①

近期，因於量化評價的形式化弊端，回歸以內容評價為主導的質性評價，成為一個國際性總體趨勢。2015年4月發表於《自然》雜誌的“萊頓宣言”，便是向“質性評價為主，量化評價為輔”轉折的重大信號。^②在2019年世界頂尖科學家莫比烏斯論壇上，2013年生理學或醫學獎獲得者蘭迪·謝克曼呼吁：“作為學者，我們是依賴於學術界的同事對我們的評價，以此獲得工資、資金和晉升的機會。我希望思考學術人員在評價學術文章中的作用，而不是用扭曲的學術期刊影響因子。”“通常高引用率的文章，並不一定質量很好，有時候一篇有錯誤或者爭議的文章，也很引人注目。所以，這些所謂的Luxury雜誌的編輯們知道這一點，在選題上盡量選取更加‘性感’或具有挑戰性的主題。這實際上是在製造論文泡沫，同時也給其他重要的研究工作帶來不利影響。”^③就在眼下，2019年12月18日，國務院通過《國家科學技術獎勵條例（修訂草案）》。尤其值得業界注意的是，條例規定，2020年度國家自然科學獎提名書將取消填報“SCI他引次數”的硬性規定，這無疑是一個值得關注的新動向。

當然，對於計量評價，也不能一棍子打死。客觀地看，受制於社會整體環境，在學術共同體建設難如人意、不能獨立擔負起評價職能的背景之下，計量評價不失為一種退而求其次的選擇。只是，計量評價之先天弊端，並不應因此而為人們所刻意迴避。筆者倒是覺得，量化評價指標體系之中的“半衰期”指數，也就是期刊刊文的生命力週期，是個並非急功近利的良好指標設計。半衰期越短，說明期刊的學術性越差；半衰期越長，則表徵着期刊的學術性越強。它形象地說明着一本期刊的學術生命力的長短、學術史積澱和貢獻的大小，也就是學術生命力週期的半徑之幅度。令人遺憾的是，在量化評價體系之中，這也是一個其重要價值被普遍忽略的指標。^④

二則，與戰略性思維缺席相應，策略主義思維在刊界大行其道。所謂策略主義，是市場主體基於自己的功利性判斷而作出的效用最大化市場選擇。人文社科學術期刊界作為一個“類市場”，自打進入計量時代，同行之間的高度競爭態勢，用“慘烈”來形容，似也不算過分。為了實現對於影響因子的最大化追逐，進入或保住來源期刊，某些業者急功近利、不計成本、不惜代價地採用一切有助於目標實現的技術、策略和手段，而不論其公平、正當與否。表現為或大幅度減少其刊文篇次，或組

織“互引聯盟”，或與作者建立有償引用關係，不一而足，形成事實上的“虛假引用”和“虛假評價”，從而嚴重惡化了行業心理和生態環境。^⑤

三則，行政性量化評價體系不分學科屬性，以影響因子“一把尺子量天下”，導致綜合性期刊一窩蜂撲向應用學科，爭相搶佔影響因子高地，以至於零被引論文被戲稱為“僵屍論文”。此一趣好進一步傳導至學界，影響所及，冷僻小眾學科乃至獨門絕學的相關研究成果難以見刊，傳統學科遭致嚴重削弱。這一現象類似於行為經濟學所謂“偏好替代”。行為經濟學認為，行為主體在跨期選擇時“存在系統的‘短視’認知偏差，形成短期貼現率高、長期貼現率低的不規則的時間偏好結構特徵。具體來說，行為主體會更看重短期的成本收益比，而對長期後果則考慮較少”。^⑥“目標可以轉譯為一系列代表相應結果的價值優先權或實用功能。如果没有清晰的優先次序，理性評估和選擇就不可能發生。”^⑦“偏好替代”反映在績效評估上，就是迫於嚴峻的定量排序壓力，業者極端關注與追逐影響因子指標，甚至出現“影響因子崇拜”症候群。諸多綜合性學術期刊甚至不惜變更辦刊宗旨與方向，置期刊的既有學科與專業特色於不顧，“計不旋踵”地向高被引學科變移。行政性“量化剃刀”的“一刀切”效應，消滅事物自然演化規律與差異化發展格局，尤其不利於人文學術期刊的生存。據統計，目前社科領域發文量已膨脹至人文領域的15~50倍。此種反生態做法，使得有些名刊為幾代人層累而成的獨有期刊風格這一無形資產，一夕之間坍塌而蕩然無存。

近期，政策層嚴厲批評教學科研領域廣泛存在的嚴重的“四唯”、“五唯”現象，但效果不彰。原因在於，雖然說是看準了問題把準了脈，但所開出的“自下而上”治理路徑或者讓基層組織檢討式“自反”的藥方，顯然並不對症。不論“四唯”還是“五唯”，都只不過是所存在問題之癥結的映像，而不是問題賴以生發的根源。也因此，僅止於聲討“四唯”、“五唯”之現象，或止於基層“神經末梢式”檢討，而不是尋根問底，探尋與挖掘其賴以生根的體制、機制根源，不過是隔靴搔癢，即使一時間反掉“四唯”、“五唯”，風頭一過，還是會生出“七唯”、“八唯”。對於量化評價體系所產生的問題及其檢討同樣如此，關鍵是要找準癥候的病灶，進而予以根除。

上述行政化“量化剃刀”式外部評價所產生的負效應，不免讓人聯想到現代城市綠化、美化過程中所流行的千篇一律的“草坪文化”。此種城市綠化文化在性質上屬於“建構性文化與秩序”，主要是以人工草坪取代做為“自發秩序”的叢生的雜草，以追求一統、整潔之視覺效果。其優點顯而易見，那就是整齊劃一，美觀大方，且便於修剪打理。但其缺點也同樣顯明，那就是人工草坪的種植原則，是以同質性排斥多樣性，把異質性元素視作“壞”的成分予以清除，從而改變和否棄多彩元素相競互補、互惠共生的良好生態系統，往往使得人工草坪因不適應所生存之環境，而變得孱弱不堪，既旱不得，又澇不得，還易招蟲患，不得不經常進行一體性更新，因而養護成本極其高昂。與之相反，各色原生雜草因環境而生，多元互補、互惠共生而自成生態系統，歷經生存考驗而與環境融為一體，既抗旱又耐澇，抵禦病蟲害的自我修復能力尤強，因而總是生機勃勃。這是與盲目干預自然生態規律的“草坪文化”正相對應的順乎自然生態規律的“雜色文化”。^⑧學術期刊的生存與發展，是走“草坪文化”之路，還是走“雜色文化”之路，似乎仍然是個問題。

基於行政性量化評價所存在的致命缺陷，筆者認為，尊重學術期刊發展生態規律乃至學術進步生態規律的評價體系，起碼應當具備這樣的特點：內容評價而不是形式評價；非功利性評價而不是功利性評價；非建構性評價（擴大評價主體基數，實行較大範圍的自發性、非建構性讀者民主評價）而不是建構性評價；中長時段評價（看重學術史積澱與貢獻）而非短時段評價（以致盲目追逐熱點、諛世媚時）。其中，最為緊要的一環是：評價方式宜採行同行多元定性評價（“代表作制”及“抽查

制”並行)與量化評價相結合、專家(菁英)評價與讀者(民主)評價相結合的基本原則。^⑩換言之,超越淺表性、“一刀切”的行政化量化評價,“唯一的希望在學術共同體本身,在學術共同體內部建立起一套民主的討論與協商機制,通過競爭性的評審、對學術的專業討論、多種價值與利益的博弈、協商與投票,逐步建立起學術共同體的內在價值標準和程序性規範”。^⑪一言以蔽之,就是以多維多元複合式評價,取代一維單元簡單化評價,目的在於回歸學刊的本來面目和本真使命,保護、保守、光大期刊得之不易的自身既有傳統與風格,最終服務於學術事業的繁榮與發展。如此,方可實現形式正義與實質正義兼而得之的評價正義。

當然,我們應當看到,有的評價體系也在注意聽取來自學界與刊界的聲音,不斷地對評價體系和評價指標進行調整,力圖使所得評價結果更加趨近於業界和學界的大致判斷。目前,A刊以吸引力、管理力、影響力作為一級評價指標;B刊以被引量、被摘量、被引量、他引量、被摘率、影響因子、獲國家獎或被國內外重要檢索工具收錄、基金論文比、Web下載量等9個評價指標作為主要評價指標;C刊遵循定量(文獻計量指標)評價與定性(學科專家)評價相結合的原則,量化評價體系以被引頻次、影響因子、即年指標、期刊影響廣度、地域分布、半衰期等定量指標構成。其中,被引頻次、影響因子構成核心數據。而在三大評價體系之中,又以C刊指標體系的相應調整和改進最為明顯。據筆者所掌握的零散信息,C刊近期調整動向大致如下:(1)增加C100來源刊。估計相當於C刊權威。(2)對綜合刊進行人文與社科分類評價。假設,綜合刊期發文量佔比70%以上,屬人文類;反之,屬社科類。這是業界施壓的結果,無疑是值得稱許的動向。(3)“以刊評文”與“以文評刊”相結合。即以“代表作制”和“論文抽檢”變量,部分消解量化評價的弊端。(4)來源刊大幅縮減刊文量的投機行為,被其納入監控範圍。(5)壓縮以高校學報為代表的綜合性期刊的來源刊數量指標,以引導綜合性學術期刊的專業化轉型。(6)引導期刊注重引注形式規範,設定來源期刊引文差錯率門檻指標。(7)增設十年期“中段評價”類目,延展評價工作的縱深度。

在筆者看來,各評價體系的這些新舉措與新動向,大多屬擇善而從,值得業界肯定。但諸般新舉措,尚不足以改變其計量評價的基本屬性。更為根本性的變革,還需拭目以待,那就是在體制層面,諸評價體系回歸其原初的數據服務職能;與此同時,行政權力與評價體系脫鉤,從“裁判員”退回至“服務者”角色。唯其如此,學術期刊為行政性量化評價所宰制而變異的困局,方可被根本性破解。

三、“計量時代”綜合性學術期刊的困境及其解脫

在全球範圍,最早的學術刊物出現於1665年,是由英國皇家學會出版的《皇家學會哲學會刊》。其主要目的是協助交流,而不是發表研究成果。在西方學術期刊界,編輯出版專業刊與專題刊是其一貫的辦刊傳統。與之不同,受蘇聯式一統學術體制的影響,中國高校學報以及社科院系統的院辦學術期刊,多採用學科綜合的辦刊模式。^⑫這正是“計量時代”人文社科綜合性學術期刊陷於辦刊困境的學術體制根源。

學術期刊的根本職能是為學術群體提供自由交流的開放空間,以營建和凝聚學術共同體。但是,隨著外部評價體系的行政性、宰制性介入,學刊的性質和職能因為生存問題而發生顯著變異,與其提供自由交流的開放空間、營建和凝聚學術共同體的本質使命日益游離。行政性量化評價所引致的期刊等級制、圈子化的轉向,使得這一學術公器日漸異化為獲取文憑、謀職、晉升、跳槽等等的“敲門磚”。如此境況,使得諸多學術期刊不得不在學術公器與功利私器之間徬徨和徘徊。尤其是

對於那些個不乏純粹學術追求的辦刊人來說，猶如“戴着鐐銬跳舞”，在無奈之中徒勞地掙扎。

面對如此窘境，刊界尤其是綜合刊當何以自處？以怎樣的面貌而存在？且當以 C 刊為代表的以計量為主體的評價體系，擬議即將縮減綜合性期刊的來源刊指標時，綜合刊在評價體系的總體評價中，將處於更形不利的境況。確定無疑的是，這將引發綜合性人文社科學術期刊界別的新一輪恐慌性躁動。

那麼，接下來的一個嚴峻問題，便是身處無以逃避的計量時代，面對以行政性量化評價為特徵的外部評價，人文社科綜合刊究竟應當如何應對？在筆者看來，人文社科綜合刊的應對之策，可用十二個字予以概括：“形塑風格，堅守自我，順勢而為。”你所面對的，已經不是曾經可以被平視的民間評價，而是一錘定音的、自上而下的官方評價，你無由也無力抵抗！但順應不等於隨波逐流，而是宜進行主體性因應，頑強地打造屬於自己的風格。只有奮力突顯自我，才不至於沉寂甚至沉淪。

1. 走“小綜合，專題化”的“中間態”辦刊路徑。

關於綜合性學術期刊的未來出路，近來業界不乏討論甚至爭論。²²但有一點不容置疑，那就是，綜合刊這一類型仍有其存在的必要性。正如《學術月刊》前任總編王亞夫先生早在 20 世紀 80 年代初就認識到的：“綜合性刊物還是有它的作用，有它存在的必要。綜合性，正是它的特點。哲學、社會科學各門學科既有區別，又有聯繫。一個專業理論工作者不能只讀與自己有關的專業文章。搞哲學的要了解經濟學中所提出的問題，搞經濟學的要了解哲學。各門學科都有相互了解的必要。有些問題是大家都關心的，如‘一分為二’與‘合二為一’問題；生產目的問題等等。綜合性刊物應該多抓大家共同關心的問題，少搞過專過僻的東西。作為一個專業理論工作者，如果能夠通過一本綜合性的學術刊物，了解整個哲學、社會科學界的研究狀況，對他的研究工作是有好處的。”²³

只是具體到綜合刊的定位，多年來相沿成習的無機大拼盤式的傳統辦刊模式，無疑已是死路一條，再也不能陳陳相因了。但是，在綜合性學術期刊尋找新的突破之際，也要力避走向一窩蜂專業化的另一個極端。面對專業刊與專題刊的兩面夾擊，綜合性學術期刊一窩蜂地擠向專業化、專題化辦刊路徑，也不太現實；另闢蹊徑，走“小綜合，專題化”、介於專綜之間的“中間態”辦刊路徑，比較符合既有實際。如此，也就使得傳統人文社科期刊兼具綜合刊、專業刊及專題刊的各自特長，反而化劣為優了。

在學科細分與交叉齊頭並進的今天，輔以科學技術的助推——比如人工智能、基因編輯技術研究的突飛猛進，使得融合成為其中的一大趨向。不同於專業性期刊，綜合性學術期刊的優勢，正在於學科交叉與融合。由此說來，綜合刊也並非像有的業者所批評的那般不堪。但學科交叉與融合在綜合刊上的體現，不應是欄目間無內在有機聯繫的大拼盤無機組合，而應當是實現相近或相宜學科之間的實質性融合。換個說法，就是把相互之間具有內在聯繫的學科，通過創新性欄目設計，實現有機融合，以取代目下綜合刊普遍存在的、以一二級學科命名的無機機械式欄目組合方式。此種融合最重要的實現形式，無疑就是專題化——只是，這個專題是不同學科互相激蕩所生成的、共同感興趣的話題；或者用不同學科的方式方法，研究一個共同感興趣的問題；或者以不同學科角度和觀點，觀照和論說同一個話題；或者以跨學科的方法和觀點，去檢視一個普遍性、整體性問題。

《讀書》2017 年第 5 期發表過一篇相關的文章，題目為《如何把握我們這個複雜的時代》。這篇文章實際上是圍繞“新人文精神”而展開的一個對話。其中丁耘的一個看法，引起筆者的興趣和思考。他認為，當下人文學科存在總體性危機，而總體性危機一定需要有各自學科的協同研究。“由於目前的學科壁壘，在進入各自學科之前，很重要的事情大概是前學科的描述。對現實的把握

是最容易產生對話的地方。較一致的前學科描述或可彌補各學科間的差異。”

此文所給予筆者的啟發,是按照這一“前學科描述”思路,可以恰如其分地發現“小綜合”性人文學術期刊不同於專業性期刊的獨特定位,進而形成與專業刊之間清晰的區分度。依此思路,各人文綜合刊的學術生長點甚至其風格定位,恰恰在於“基於學科差異的前學科對話”。原因很簡單,這個位置是最容易產生話題和對話的地方。一旦找準這一定位,並使之與期刊自身的歷史積澱、傳統優勢、學科或專題側重完美地結合與統一起來,一本特色鮮明的“小綜合”期刊,就栩栩如生了。這樣的概括,與《文史哲》前主編陳炎先生“學貫文史哲,理通儒釋道”的辦刊理念,和現任主編王學典先生所謂“非文非史非哲,亦文亦史亦哲”的“小綜合通科”辦刊思維,極相近似。

2. 以問題凝練學科,而非以學科切割問題。

由“小綜合,專題化”的“中間態”辦刊原則所決定,必然會提出“以問題為中心”的欄目設計理念。這一先決理念,把“問題”看得比“學科”更重要,更帶根本性。^④通過超學科問題的凝練,實現學科之間的有機融合,形成融合性學術生態。其具體路徑可簡括為:提出為不同學科共同關注、但僅靠學科知識結構又難以解決的跨學科或超學科問題——展開學科內或跨學科研究——得出跨學科或超學科研究的結論。

如果說,我們把不同學科的專門化研究視作一股股各各相異的“潮流”,那麼,對於綜合性人文社科期刊而言,它的優長正在於匯集不同學科,進而去關注被各專業學科所忽視的潮與潮之間的交匯地帶,即“潮間帶”。換言之,綜合性人文社科學術期刊的辦刊理念及其實踐,必須注意處理好具體學科與超學科之間的關係,既不能陷於具體學科、糾纏於瑣細問題而不能自拔——這等同於以自己的“特短”去搶奪專業刊的飯碗;也不能脫離具體學科,盲目求全、求大、求博而變得空疏無根,甚至失去特色——這正是我們試圖所要療治的、綜合刊的共通性病癥。適宜的操作策略,應當是沿着“前學科——學科——後學科”的路徑,籌劃綜合性人文社科學術期刊的特色化出路,如此,才可找尋到綜合刊的恰切定位。^⑤

具體而言,無論是選題還是欄目的組織策劃,都應從超越具體學科的“前學科”層面,即中觀與宏觀視域切入與考量;進入具體稿件的組織環節,則宜從具體學科入手,微中知著,小中見大,尋求之於學術問題的專業化解決方案與答案;而最終的目的或目標,則又是從具體學科中游離出來,進入“後學科”的寬廣視界,尋求超學科的共通性、普遍性價值和意義。這一過程,也可以用“抽象——具體——抽象”三部曲予以表達。當然,如何能夠發現和提出超越學科壁壘的“問題”或“話題”,也正是目前綜合性學術期刊及其編者的普遍性困惑所在,考驗着人文社科綜合性學術期刊編者的學術視野與眼力,也直觀地反映着其與學界的互動與交流程度。

3. 提高期刊內容的集中度,獲致集約與集群效應。

與上述內容高度相關,自覺綜合刊最為理想的辦刊方式,是進行可持續的專題性選題策劃和組織,形成內容和論域的適度集中,以及欄目的集群效應,以求實現某一個點位的突破;進而通過這一亮點,吸引讀者注目,形成眼球效應,帶動期刊的整體性發展。一個公理性的辦刊原則就是:影響力取決於集中度。抓住集中度做文章,無疑就抓住了辦好學術期刊的牛鼻子。

集群效應,是個生物學名詞,它是指同種生物聚集在一起生存所產生的良好生態效應。借用於期刊發展,所謂集群效應,就是期刊內容集中度的外部化或社會化;或指期刊選題策劃以及相應討論的較高的集中度和內在關聯性。只有提高期刊內容的集中度,才能形成集群效應,進一步凝練特色,也才能為相關學人所注目。比如《國際社會科學》雜誌以及《文史哲》英文版,總體上看,是綜合

刊或“小綜合”，但每期只是集中討論一個話題。所以，具體到每一期，則又帶有專題刊的性質。這樣就既保持了綜合刊的宏觀性、融合性的優勢，又迴避了綜合刊在專業性方面的不足。這一辦刊思路，可以概括為“問題導向，專綜結合”的嘗試。當然，這樣做也有不足之處——雖然部分迴避了綜合刊的劣勢，但話題的游移性，使得她難以長效地、持續性地鎖定專業讀者，也即難以培養相對固定的、忠誠的讀者群。當然，數字化時代讀者的“檢索式閱讀”方式和習慣，已然淡化了這個曾經引發同業廣泛焦慮的問題。

若說是更進一步，則宜在可持續的專題性選題策劃和組織的基礎上，增強專題的討論性和回應性。即是說，圍繞一個專題或話題，從不同側面、不同角度甚至是不同學科予以切入，展開深入討論，以達到在理論和方法上互相切磋、互為啟發之功效。如果能夠做到使話題的討論更加具有現場感、熱烈感和及時回應性，那就難能可貴了。當然，這便對編輯者提出了更高的專業化要求，即必須能夠就專業性學術問題與專家學者展開對話，甚至引導專家提煉與凝聚擬議討論的話題。

在綜合性學術期刊限於體制的束縛，一時無法轉型為專業刊的狀況下，一個次優選擇，就是基於期刊與主辦單位的自身傳統和學科優勢，或者是基於所在地域的獨特文化資源，進行差異化選擇，實施特色化建設，提高期刊內容的集中度，達致集約與集群效應，形成“一刊一特欄，一刊一特色”的良好局面。如此，即會形成良性的差異化競爭和錯位化發展格局，一定程度上改變為學界所詬病的、由無機化機械組合所形成的“千刊一面”、了無生氣的沉悶局面。

4. 進行以凸顯特色、個性和品牌為前提的“歸核化”經營，構建以主打欄目為軸心的同心多元體系。

與前述理念相關聯，在綜合性人文社科期刊的辦刊理念上，它主張進行以主打欄目為核心的“歸核化”經營，即構建以主打欄目為軸心的同心多元體系，從而完成期刊自身的特色化與個性化定位。由於同心(有機)多元化以主打欄目為軸心，因此，它比“無機多元化”——毫無特色與個性的一二級學科命名之欄目拼盤——具有更大的競爭優勢；它主張期刊依據自身優勢，進行差異化分工，各自培育不同於他刊的特色優勢欄目，進而形成個性化的核心競爭優勢。當然，這必然是一個經濟學所謂通過法治化市場公平與正當競爭而自然演化的歷史過程和應然結果。

因此，學術性期刊尤其是綜合性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如果說非要總結出一個辦刊的秘訣，那就應當是：個性，個性，還是個性。^⑤個性、特色與品牌，無疑是超然於時代、超然於任何評價方式的辦刊要件。而一本期刊的成長、發展與成熟，正是沿着特色——個性——品牌的路徑一路走來的。對於綜合刊而言，這無疑更為緊要。概言之，就是保守傳統(自身歷史積澱是什麼以及如何保存與弘揚這一精神財富)，凸顯特色，型塑個性，打造品牌。

那麼，特色是什麼？就是“人無我有”的個性風格，“與其第一，不如唯一”。比如領域的開拓、專題欄目的設置，堅持“不同於人”的個性化追求，強調佔先性甚至獨佔性。所謂個性，就是“不可取代性”。沒人能夠無視或取代你的存在，便是你最根本的個性。個性如此重要，以至於沒有個性，期刊的“這一個”與“那一個”便沒有了界限，也就失去了賴以存在的依據，只能如歌曲《存在》中所唱的那般，“找個藉口繼續苟活”。期刊個性恰如“美眉”的臉，風格不同，美而各異，才楚楚動人。每張臉長得都毫無二致，“泯然衆人矣”，便顯得平淡了。那麼品牌呢？學術期刊有其特殊的商品屬性，它以發表精良的學術成果、開展學術爭鳴、引領學術潮流來贏取讀者。因此，作為學術期刊的生產者和經營者來說，同樣也需要強化品牌意識，注重期刊的品牌建設。

品牌建設和特色定位，是期刊發展過程之至為重要的一步。編者只有擔當起文化傳承的責任，

肩負起繁榮學術的使命,也才有可能以戰略家的眼光去一以貫之地強化品牌意識,進行品牌建設,學術期刊才會產生廣泛的影響,擁有眾多的讀者。學術期刊雖然不同於一般企業的產品,通過自由競爭去佔有市場,但在某種意義上,它也是商品,它也要面對同類商品之間的激烈競爭。只是,它有其特殊商品的屬性,即不以銷量和盈利為追逐目標,而是以發表精良的學術成果贏取讀者,獲得讚譽。^⑦但凡在學術市場競爭中始終居於有利地位的學術期刊,無不高度重視品牌建設,也無不是響噹噹的業界品牌。

品牌不僅僅是期刊的名稱,在名稱背後,它還傳遞着期刊的內涵、特色、風格等信息,以及辦刊人的理念、品位和境界。期刊的內涵也就是內在質量,是支撐期刊品牌的最主要因素,某種意義上是唯一因素;主辦單位等是第二位的因素。為什麼這樣說?事實已經證明,一流的主辦單位不一定辦得出一流的期刊;二三流的主辦單位也不乏辦出一流期刊的案例。所以,人文社科綜合性學術期刊界沒有必要妄自菲薄,自輕自賤。只要走集約化內涵發展之路,凝練自我風格和氣韻,輔之以超學科特色欄目策劃和組織,以問題帶動學科,假以時日,必定會創出富有學術甚至社會影響力的期刊品牌。

結語

當下時代,對於綜合性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的生存與發展而言,從外部評價的角度看,無疑是一個計量時代。但無論如何,這確乎仍然是一個學術的時代。兩相比較,後者是更為本質性和決定性的存在,它是跨越時空、超越時代的永恆性存在。也因此,決定了我們必然要立足於學術的主體性立場,來看待和評價計量時代林林總總的學術期刊評價體系,進而來研判綜合性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的未來發展所應選擇的路徑。當業者普遍回歸並致力於繁榮學術事業、推進人類文明進程的歷史使命和職業擔當,而不是孜孜於揣摩外部評價體系的評價偏好以投其所好的時候;當期刊人秉持自我主體精神,凝練和型塑期刊風格、打造期刊獨有個性、走品牌化發展之路的時候,便意味着我們找回了失落已久的學術期刊的本質,回歸了應然性學術生態,也便意味着期刊人方才無滯無礙,進入“辦刊自由”之化境。

①余建國:《數字文明時代,一個新的人類時代的到來》, <http://blog.sina.com.cn/qmgbaby>, 2017-04-27 13:32:02

②靈子:《不敢樂觀,也不敢悲觀——對話何兆武》,載靈子:《憂鬱的常識》,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年。

③所謂A刊、B刊、C刊,即中國社科院所屬中國社會科學評價研究院自2014年開始發布的“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期刊AMI綜合評價報告”,北京大學圖書館自1992年始發布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南京大學1997年開始研製的“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

④《前任諾獎得主本庶佑談科研:論文發表十年之

後,觀點正確的只剩下一成》,墨香學術微信號,2019年10月28日。

⑤⑪劉京希:《學術期刊評價:形式為王還是內容為本?》,廣州:《華南師範大學學報》,2015年第5期。

⑥《學術期刊的所能和所願》,華東師範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微信公眾號,2019年11月15日。

⑦米爾頓·弗里德曼、羅斯·弗里德曼:《自由選擇》,胡騎、席學媛、安強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導言。

⑧⑮劉京希:《誰是學術期刊內在質量的鑒評者》,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5年第3期。

⑨⑳許紀霖:《回歸學術共同體的內在價值尺度》,北京:《清華大學學報》,2014年第4期。

⑩龔刃韜:《“拖後腿”的中國人文社科》,愛思想網, <http://m.aisixiang.com/data/116799.html?from=timeline>, 2019-06-21 20:41:35。

⑪“萊頓宣言”的提出源於2014年在荷蘭萊頓召開的一次國際會議。美國佐治亞理工學院的公共政策教授 Diana Hicks 等提出了合理利用科學評價指標的七條原則,後來擴充為十條。簡言之,第一,量化評估應當支撐質化的專家評估,而不是取而代之;第二,衡量績效應基於機構、團隊和個人的科研使命;第三,保護卓越的本地化的相關研究;第四,保持數據採集和分析過程的公開、透明和簡單;第五,允許被評估者驗證數據和分析;第六,考慮發表和引用的學科差異;第七,對個人研究的評價應基於其綜合作品的質性評價;第八,應避免評估指標的不當的具體性和虛假的精確性;第九,識別認清評價指標對科研系統的影響;第十,定期審查評價指標並加以改進。

⑫蘭迪·謝克曼:《虛假的影響因子是為了銷售學術期刊》,文匯客戶端,2019-10-31 09:57:13。

⑬就在本文成文後的一周之內,得到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採行“中段評價”(10年期)指標的信息,無疑令人欣慰。

⑭葉德珠:《地方政府投資中的衝動與拖延——中國經濟過熱的一個行為經濟學解釋》,鄭州:《經濟經緯》,2008年第5期。

⑮參見斯格特:《組織理論》,黃洋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年。

⑯劉京希:《論“草坪化政治”與生態化政治——兼及政治生態指標測定》,成都:《四川大學學報》,2019年第3期。

⑰劉京希:《構建公正理性的期刊評價體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報》,2017年4月11日。

⑱徐賁:《賀衛方有資格當教授嗎》,“書時光”微信

公眾號。

⑳2019年春季,在由湖北民族大學學報編輯部主辦的“首屆學術期刊政治學編輯論壇”上,便展開過一次有關綜合性學術期刊是否有必要進行專業化轉型的激烈爭論。

㉑王亞夫:《關於〈學術月刊〉的性質、對象和方針問題》,上海:《社聯通訊》,1980年第10期。

㉒關於綜合性學術期刊改革與發展路徑的看法,可參見仲偉民:《調整是綜合性學術期刊發展的必然選擇》,重慶:《重慶大學學報》,2007年第4期;葉祝弟:《綜合性學術期刊評價困境蠡測——綜合性學術期刊評價體系建構略論》,合肥:《學術界》,2019年第8期。

㉓王學典先生有關“新文科”建設的問題導向思路,大可用之於綜合刊的辦刊探索實踐:舊文科強調分科治學,新文科應該強調聯合攻關、科技整合、協同治學。應該以問題為平台來整合學科,而不是以學科為平台來切割問題。參見王學典《把中國“中國化”:人文社會科學的轉型之路》,北京:《北京日報》,2016年9月26日。

㉔劉京希:《個性決定期刊的生命力》,北京:《光明日報》,2004年9月30日。

㉕在國際學術期刊界,一般來說,評價一本期刊的優劣,如果說銷量是一個衡量指標的話,那恰恰是看誰的發行量更小,而不是更大。發行量越小,往往說明期刊的讀者層次越高,受眾面相應收窄,因而,期刊的學術性越強。

作者簡介:劉京希,山東大學《文史哲》編輯部教授,副主編。濟南 250199

[責任編輯 劉澤生]